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主编 葛红兵

“后革命”

作为一种
类型叙事

赵牧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主编 葛红兵

“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

赵 牧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 / 赵牧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12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 葛红兵主编)

ISBN 978 - 7 - 5671 - 0144 - 9

I. ①后… II. ①赵…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272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编辑/策划 陈海清 许 铭 江振新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

赵 牧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 - 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13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1 - 0144 - 9/I · 152 定价：51.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专著探讨“革命”的观念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革命”的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所谓“后革命”的“后”，一方面是对“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的“后”，一方面是对“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反思后的“后”。探询了革命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发生发展及转化的历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

总 序

本课题于200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09BZW014),但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实际研究。8年间参加此课题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俞亚赞、叶祝弟、李瑞明、张永禄、徐秀明、肖青峰、谢彩、张默、侯学标、Raffaella Buonocre(英国、意大利双国籍)、许铭、许道军、陈佳冀、谢尚发、刘凤美(泰国)、杜建、王环环、毕旭玲等19人。除了我完成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之外,团队完成的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论文共18篇。除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理论批评史、欧美小说类型理论史研究外,我们更多的是针对某个小说类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武侠、言情、玄幻、官场、侦探、法制、都市、成长、历史、家族、民间故事(上海海洋故事)、动物叙事、恐怖小说等近20个领域。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类型理论的缺乏、类型学方法探索的困难是一个方面,同行的不理解也是一个方面,许多同行把“类型小说等同于通俗小说”,认为这是没有前途的领域,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初步成果也曾受到种种质疑。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是一个建构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体系、建构新的当代小说批评方法的大命题。事实也正是如此,2003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双年选》,公开提出“中国当代小说类型化发展趋势”的论断。之后,我们沿着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思路,以“叙事语法”为核心概念,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如恐怖小说、侦探小说、官场小说的研究等。随着类型学元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研究的

逐步成熟,我们又把研究重点扩展到“叙事成规”、“地方性叙事”与“民族志类型”、“方音类型”研究等方面,这个阶段我们还逐步提出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这样,小说类型的嬗变规律的宏观研究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时,我们研究了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法治小说、官场小说等,并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民间故事(上海海洋传说)、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等方面。

逐渐地,类型小说研究为社会所知悉认可,更多的同道和单位加入了这一领域。《小说评论》、《时代文学》等杂志邀约我们进行专栏讨论,《文学报》、《文艺报》开辟专栏讨论小说类型化及类型小说理论批评问题。2009年年底,我们团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

中国小说理论研究不发达,且当下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处于一种“用一种小说观念来研究和批判所有小说”的状况,能否建立一种真正的小说类型理论,进而在自觉的小说类型理论支撑下对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批评?这一工作事关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化”,事关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自觉”。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建构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并进行分门别类的当代小说批评”作为本课题的最终目标。

晚清新小说家们抱着文学启蒙的理想,从西方大力引进新小说类型,如政治小说等,催生了中国现代小说类型化的滥觞。之后,中国现代出现了一批如管达如、吕思勉、鲁迅、郑振铎和胡怀琛等具有小说类型研究倾向的学者。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梳理古代小说类型的生成发展和历史“变形”,体现了小说类型学的部分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化时期的到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类型化发展的趋势。传统类型如武侠、言

情等得到长足发展,新类型如玄幻、穿越等不断产生,催生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的大繁荣。当代小说研究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钟情于类型小说的研究,如范伯群等,他们作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何为“类型小说”?“小说类型”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形式”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意义”概念?如何能找到一种可以内在地包含上述二者的小说类型学“范畴”系统?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葛红兵撰写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试图通过系统性理论思考,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实践针对性的类型学理论,为小说类型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该书以“建构中国小说类型理论,推进类型小说批评”为目的,提出超越“小说研究”沉迷于“历史描述”的现状,建构一种可以对小说进行深度“逻辑描述”的类型理论框架的构想。专著从对小说形态学、小说叙事学及结构主义小说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出发,认为可以构建一种承续又超越上述诸家理论架构的“类型学”方案,并就此提出了“叙事语法”概念;作为对“叙事语法”概念的深化,葛红兵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成性成规”理论和“地方知识”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支撑“类型”观念,并将之发展成方法论。该书还着重阐述了兼类、跨类、反类等概念,开启了小说类型学对小说类型嬗变进行宏观研究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对小说类型运动进行宏观历史描述的概念方案。

有了上述认识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寻找理论资源与经验支撑。张永禄的专著《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史,考察了鲁迅、严家炎、杨义、郑家建、施战军、范伯群、汤哲声、陈平原和许子东等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小说类型研究思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历史参照系，作为借鉴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具有深度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

接着，我们探寻了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普罗普的小说形态学，这是谢尚发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研究与中国小说类型学的方法建构》研究的课题，谢尚发对普罗普著作的“经典重读”让我们团队找到了很好的理论原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案帮助我们打开了小说类型学研究的思路，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普罗普的抽象模式隔断了逻辑和历史的联系，而只有逻辑没有历史的研究方案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这样，我们的研究方向就逐步离开了故事的功能架构层面，试图用“深层叙事语法”概念来深化我们的小说类型学理论研究，这个阶段我们比较典型的成果是谢彩的《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这本书用此理论思维来研究侦探小说，带来了前人未见的许多闪光点。但是对于深层语法的过多重视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封闭和开放性不足。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不那么“结构主义”的概念，这个过程极其漫长。时隔几年，直到“叙事成规”这个概念的发现，才让我们豁然开朗，这个概念让我们可以把小说的内部结构研究和外部文化关系的论述联系起来，达到内外平衡。叙事成规，不仅是叙事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成规中包含了小说类型作为“故事”的叙事语法内涵，同时也包含了小说作为“民族志、地方志知识”的叙事形态的文化语法内涵。此时，我们就可以把小说类型学上升到民族志、地方志的高度来看待，到这里我们的小说类型学找到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这个过程中许道军的《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专著的撰写和杜建的《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

的类型学研究》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和探索，我们的课题是不可能“结项”的。这个阶段，对具体小说类型的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的研究也被引入，尽管具体的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方法也已经基本成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把“类型指认”当做一种理论假设，当类型假设可以让我们看见别的理论看不见的东西时，这种假设的有效性就得到了验证。但是我们给出“小说类型”的定义，指认“某种小说为某个类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小说类型进行简单演绎，真实的情形应该恰恰相反。小说类型研究更多地由下往上进行，更多地来自归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小说类型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由此我们建构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来研究小说类型的嬗变及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类型小说鉴别指认，而且更将拓展类型小说研究与批评的宏观关照能力。

当然，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类型的指认曾经在“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之间犹疑，难以平衡。我们开过专题的讨论会，也写过多篇专题论文，这个时候赵牧的加盟给我们带来了《“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的研究案例，此书在我们团队内是最有争议的一部。“类型”作为一种方法，如何保持其有效的开放性？又如何保持其对“价值”、“思想”的关怀能力？这是此专著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思考。

由此，我们团队开始思考和关注“小说作为地方知识的叙事形态，其地方性意蕴正在丧失”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的民族志意蕴正在消溃，这激发我们思考“在中国普通话的强势语境下，小说作为地方志，其表现地方生活的能力是提高了还是下

总 序

降了”等问题；另外，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小说类型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空间类型诗学？“类型研究”如何有效地与上述“价值”问题相关联？类型研究如何在保持其“形式”关照力的同时，真正向“价值”问题开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我们试图以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一个总体性考察。也许我们能写出一部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史，提出一套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分类方案；同时，在类型小说批评实践方面，我们还准备加强新生类型小说及跨类小说的研究，使我们的类型小说批评得以深化和升华。

葛红兵

2012年3月18日

目 录

导 论	启蒙、革命及现代性:多重纠葛的话语	1
第一节	启蒙与革命:在现代性的视阈下	2
第二节	“新启蒙”及其限度	8
第三节	“保守主义”的多种面相	13
第四节	“后革命”的视阈	22
第五节	文本的意识形态	31
第六节	基本框架及必要解释	36
第一章	从“革命”到“后革命”	41
第一节	解构革命叙事:何以可能?	43
第二节	主体变异与革命重构	53
第三节	重建革命叙事:可能/不可能?	63
第二章	“象征”与“寓言”的变奏	76
第一节	“抒情”与“史诗”	78
第二节	“个人”与“集体”	83
第三节	“历史”与“叙述”	92
第四节	“祛魅”与“招魂”	99
第五节	“崇高”与“荒诞”	108

目 录

第三章 复线的历史:遮蔽抑或还原	116
第一节 “真相”的“还原”	121
第二节 “乌托邦”的“改写”	133
第四章 青春、革命及文本性态度	148
第一节 何谓“文本性态度”?	149
第二节 “青春”的“献祭”	155
第三节 “革命”的“回声”	162
第四节 “悲剧”的“转换”	169
第五节 模式化及其他	178
第五章 “主体”的变迁与“群众”的命运	188
第一节 “群众”的“发现”	189
第二节 “灾难”的“反思”	201
第三节 “背叛”的“承诺”	217
第四节 “暴力”的“呈现”	230
结 语 革命、人道与国家意志	245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75

导论 启蒙、革命及现代性： 多重纠葛的话语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话语，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临着深刻的转折，但是，因为话语惯性和“知识共同体”的承继、修复与转折的逻辑，它仍然被视为反思抑或批评的前文本，且广泛存在于多种多样的文学或文化叙事中。似乎摆脱对革命话语的“路径依赖”必然要以对革命话语的重述作为策略，那么，在这个重述革命的潮流中，革命历史及其话语是如何被重述的呢？这正是这本学术论著所要考察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考察，似乎有必要对革命在一个世纪以来起承转折的命运，及其与“启蒙现代性”等话语之间的多重纠葛，做一番尽可能详尽的梳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认清所谓“后革命”的具体所指，并且它在何种程度上充当了一个历史分期的角色，又在何种程度上局限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生产，它与众多后学话语间有着怎样的纠葛，并如何与一度流行的革命话语的自我循环论相联系和区分的。也只有这样，我们似乎才有可能辨识出在这种“后革命”视阈下所重述或重构出来的“革命”的复杂面相。

第一节 启蒙与革命：在现代性的视阈下

我们知道，对于社会线性进化的表述、民族国家的论说以及科学与民主的想象，以启蒙为指归的现代性观念不但为革命话语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而且使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意义。尽管只有革命才能把古老的中华帝国从蒙昧黑暗的历史中解救出来的论断充满着历史的后见之明，但其演绎的启蒙逻辑却清楚地表明，其实发生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已构成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而随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并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它的最初规划。那么何谓启蒙？革命话语又是如何内在于启蒙现代性的基本逻辑之中的？

作为一套话语体系，启蒙首先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摆脱宗教神学束缚为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为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充当先导，并最终促使其主导的现代社会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启蒙又发展出一套理性至上的信仰，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它认为只有通过积极的实践，才能不断地把人从愚昧引向智慧、从束缚引向解放、从黑暗引向光明。这种历史目的论观念既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结果，又反过来为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合法性证明；而两者又相互利用，于是在社会改造的意义上形成了所谓启蒙现代性方案。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看似把人类从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以及从神话和宗教等非理性活动中解脱出来的“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自由的社会改造方案”，却从来没有被

完整地实施过^①。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并没遵照启蒙思想家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展开，而是充满多种矛盾因素的相互斗争，其到目前为止的形态以及关于这个形态的诸多解释，正是这些相互斗争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诸多因素统称现代性，那么，现代性无疑包含着丰富的内在矛盾和张力，而以启蒙为指归的现代性不过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方面。其他如盛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所持的强烈批判态度，或者如马克思及其信仰者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所做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无疑构成了现代性的另外一些方面，但它们与启蒙的任何矛盾和纠葛也都内在于现代性的基本逻辑。

而诚如杜赞奇所指出的，到 20 世纪初的时候，这种启蒙现代性方案已成为“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但因这种信仰是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被动”产生的，因此，其关于社会线性进化的观念就不自觉地转换为一种“弱国子民”的心态^②。这时，向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借鉴，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就成为当时“感时忧国”的启蒙知识分子试图把沉睡于黑暗中的不老帝国推向现代民族国家光明之途的唯一选择；而对于自我的认同，借用汪晖的话来说，就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活动理解为“通达某一终极目标的途径”，并形成一种“将存在的意义与所属时代相关联的态度”^③。梁启超所谓的“新民立国”，既把“新民”看作“立国”的条件，又把“立国”看作“新民”的目的，体现的正是这种“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

① 哈贝马斯. 现代性：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M]//章国锋.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③ 汪晖. 死火重温[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象”中“被动”发展现代性的诉求^①。但如何“新民”，何以“立国”？则不仅出现了在“辛亥”前发生过梁启超与章太炎之间“保皇”与“革命”的论争，而且在“五四”后又有胡适与李达之间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些建立在启蒙现代性的前提下却只在实现“新民立国”这一理想的途径上存有分歧的论争，一方面扩大了启蒙现代性观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启蒙现代性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助长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国家危机意识，以及在这危机情势下践行科学、民主、进步及个性解放等启蒙现代性观念的挫败感和焦虑感。而更进一步地，以激进的或者说“革命”的方式“毕其功以一役”地解决“社会的根本性重建”，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主导性的选项。所以，此后活跃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以及为之帮忙或帮闲的知识群体，无论是以资产阶级启蒙为指导，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尽管相互间充满惨烈的斗争，却都不仅以“新民立国”作为主要的前提，而且以“革命”作为自我表述与认同的方式。这里，所谓的“革命”因言说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内涵，但无例外地，这些“革命”话语以摆脱民族危机为要务，以实现国家富强为方向，不仅与激进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而且将指导思想建立在崇尚理性和相信未来的进化论史观上。这一来，它们就至少在理论表述上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以社会动荡为契机、以民心向背为前提、以天道循环为指导、以改朝换代为特征的革命产生了根本的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中国传统的革命语汇还是英语世界的 revolution，它们在内涵与外延上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金观涛

^①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六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指出，在最初的语境中，中国的“革命”相当接近于西方 revolution 的原意，即都是指“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而自汉代开始政治权力更替需要从“天道”中找到根据，“革命”就成为周期性王朝更替、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但是宋明之后，因新兴的理学强调天道不变观念，“革命”就很少使用了，对于那些挑战正统政治秩序的事件，更多的是使用“起义”或“造反”来指代。尽管清初的汉学对于宋明理学传统有所颠覆，但是直到晚清“戊戌变法”之前，由于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得到根本的撼动，“革命”即使偶有使用也总被赋予贬斥的意义。但自从 1903 年邹容的《革命军》发表之后，这一传统词汇不仅重新焕发生机，而且星火燎原势不可挡，以致没有一个领域逃过了它的入侵。即使如今它已褪去耀眼光环，但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文化革命、学习革命以及灵魂深处的革命之类的词语组合，依然为我们耳熟能详，并不断在商业、时尚和消费等各种领域中产生新的意义^①。而对于 revolution，阿伦特曾说，它最多追溯到法国或美国革命时才被运用到政治领域，而此前类似事件都被称为“叛乱”和“政变”，这实际与传统中国社会并无不同。因此，革命的现代意义都因与启蒙现代性的关联才取得的，而且这种转换的先决条件——“像受到威胁的政府机制的崩溃、它的毁灭、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心，公共服务的失败，以及其它种种”^②——也是相当一致的。不同

① 金观涛.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J]. 台湾：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 2005, 13(6). 此外，对从话语考古的角度，对“革命”这一传统词语晚清以来如何从日本“出口转内销”，以及如何与英文世界的 revolution 发生对接进行研究的，还有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

② 汉娜·阿伦特，阿德贝尔特·莱夫.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M]. 蔡佩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